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7 冊

由適性安命到達生肆情
——西、東晉士人應世思想之轉折

王 岫 林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由適性安命到達生肆情——西、東晉士人應世思想之轉折／王
岫林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民 99〕

目 2+17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 17 冊）

ISBN：978-986-254-346-7（精裝）

1. 魏晉南北朝哲學 2. 玄學

123

99016456

ISBN - 978-986-2543-46-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十七冊

ISBN：978-986-254-346-7

由適性安命到達生肆情
——西、東晉士人應世思想之轉折

作 者 王岫林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由適性安命到達生肆情
——西、東晉士人應世思想之轉折

王岫林 著

作者簡介

王岫林，1973年生，高雄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魏晉思想，發表碩士論文《由「適性安命」到「達生肆情」——西、東晉士人應世思想之轉折》、博士論文《魏晉士人之身體觀》。另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散文隨筆散見於報章。

提 要

魏晉玄學的重心在於儒玄兼融的思想，歷來學者對此也作了許多闡釋，但多以單一思想家作為研究對象，或是探討整個時代的思想取向。但在西晉過度至東晉這個時期士人心態上的轉折與思想的轉變上仍有一些可資探索的空間，故而本篇論文基於此而將時代定在西晉末年至東晉中期，欲由此呈顯出此時期不同的時代風貌，而郭象與張湛是處於西晉末與東晉中期的重要思想家，藉由他們思想上的異同之比較，可以窺見當時思想與風尚。

全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此章主要是陳述本文之研究動機，說明研究方法及時代上的斷限，並界定「儒玄兼修」這個詞語之定義。

第二章：西、東晉時代背景解析。對於西晉末年與東晉初期的時代背景作一論述，西晉末年的政治環境是八王亂政的混亂場面，帶給士人的衝擊是為保身家而依違應世，或縱酒避世，在現實上的痛苦致使士人對命運採取天定的論調，並漸漸向宗教靠攏以尋求精神上的解脫。門閥士族的持有特權使其對維護儒家名教不遺餘力，另一方面，對哲學議題的思辯與反映當代政治紛囂，使士人投身於玄理清談，是玄儒雙修思想形成之背景。東晉時門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的改變，使得士人的應世重心漸由國家政治轉向個人，更重視自我。

第三章：適性安命的融世思想——郭象玄學。本章對郭象思想由自然觀至人生觀作一理論上的呈顯，論述其逍遙義與「適性安命」的兼融思想，再由郭象思想的時代性與重要性，來論證其對時代的反映，及對西晉末期以下士人思想的影響。

第四章：儒玄雙修思想的流變與特色。此章首先論述儒玄雙修思想背景，由漢末的糾浮華之風談起，到王弼的貴無思想、裴頠的崇有論，郭象的調和自然與名教，是儒玄雙修思想的一再調和與修正，張湛承續了這個理路，卻走向超越的思維模式。再則列述西、東晉之交的主要代表人物，將其分為較偏向郭象的安任與偏向張湛的超脫之差異性，並各別對其思想、行為有較為詳盡的解說。

第五章：超脫與肆情的糾結——張湛玄學。本章首先對張湛的形上思想、貴虛的宇宙觀作一說明，由此帶出他達生肆情的命論與人生觀。文末論述他如何將超脫的形上思想與肆情的人生觀結合，反映了東晉士人在生活上追求優遊閒適，在精神上重超脫的心態。

第六章：結論。總結全文，將西晉末期與東晉初期的士人心態作一比較，並由郭象與張湛思想的差異性看這二個時期的不同與特性，希冀由此窺見時代風貌與士人心態的轉變。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方法與時代界定	1
三、語詞界定——儒玄兼修	3
第二章 西、東晉時代背景解析	7
第一節 不安與殺伐的歲月——由混戰到和靖	7
一、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的血腥奪權	7
二、東晉渡江——動亂之後的苟安	10
(一) 和靖政策——王、庾、桓、謝的主政	10
(二) 保江東的政策——偏安心態的呈現	13
(三) 門第把持——世族之利益世襲	14
(四) 身家爲重——政治形態的轉變	18
第二節 西東晉士人風尚	20
一、浮華放浪之風	20
二、力與命的論辯	26
三、玄禮雙修思想的形成	34
四、宗教的介入	38
小 結	42
第三章 適性安命的融世思想——郭象玄學	43
第一節 郭象自生獨化論——統合名教與自然的調和主義	43
一、「自生」說與「獨化」論	43
二、性分論	48
三、逍遙義	56
四、儒玄思想的會通	59
第二節 郭象承先啓後的歷史地位	62
一、郭象的總結西晉玄學思想	62
(一) 郭象玄學是西晉思想的總結	62
(二) 郭象思想反映西晉士人心態	66
二、郭象「適性安命」論對東晉士人心態的影響	71
(一) 偏安思想	71
(二) 放曠思想	76
(三) 朝隱之風	79
小 結	83

第四章 儒玄雙修思想的流變與特色	85
第一節 魏晉時期「儒道雙修」思想的蘊成	85
第二節 西、東晉之交儒玄雙修之主要代表人物	92
一、較注重現實層面的思想家	97
(一) 樂廣——名教中自有樂地	97
(二) 謝鯤——居身於可否之間	98
(三) 江惇——動靜不違禮法	99
(四) 王導——務存大綱，不拘細目的憤憤之政	100
(五) 庾亮——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	101
(六) 桓溫——聽禮而悟玄門	103
二、較注重精神層面的思想家	104
(一) 戴逵——禮度自處、倡言玄心	104
(二) 王羲之——終焉山林的悠遊之志	107
(三) 王坦之——唯變所適的應變觀點	110
(四) 謝安——鎮靜朝野的風流宰相	111
(五) 孫盛——善言名理、著述經典	114
(六) 孫綽——出處同歸、隱顯如一	116
(七) 顧愷之——傳神寫照的繪畫理論	120
小 結	123
第五章 超脫與肆情的糾結——張湛玄學	125
第一節 至虛的宇宙觀	125
第二節 達生肆情的人生哲學	130
一、命定論——命非己制，智力無施	130
二、肆情論——得盡當生之樂	131
第三節 生死觀——超脫生命的曠達思想	134
第四節 生命的反思到情性的肆縱	140
第五節 張湛思想所反映的東晉士人心態	142
第六節 虛實之間——郭象的安任與張湛的超脫的比較	149
小 結	153
第六章 結 論	155
參考書目	161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

魏晉是一個十分豐富與多變的時代，這個時代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一群特殊的名士，他們有著鮮明的人格特質與特殊的審美眼光，著重自我個性的發揮與覺醒，因此在這個時代，任何事物與個人都是可欣賞且不可取代的，而他們對於個性的自然抒發也與漢代對自然情性之壓抑有很大的差異。故研究魏晉在我來說，少了學術研究的枯燥性而多了另一種鑽研與欣賞的樂趣。

歷來對魏晉玄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各個思想家的思想研究，而魏晉時期各個重要的思想家，也都有許多前輩對他們的思想作出精闢的分析與見解。本篇論文，主要欲探討自西晉元康時期至東晉中期士人的思想轉變。而身處富饒的江南，東晉士人的思想與西晉士人有何差異。在探討這樣的差異性時，以郭象與張湛作為當時思想的代表，郭象與張湛分別是西晉與東晉的二代思想家，其學說最能代表當時的時代思潮，總結當時士人的思想。因此我想藉由郭象與張湛之間的差異性來探討西晉到東晉之間士人思想的轉變，以及他們是受到什麼影響，以致於有這樣的改變。他們心態的呈現為何？在郭象與張湛同樣是兼綜儒道的思想之下，他們思想的差異性表達了什麼義涵？而我也藉著分析同時代士人思想的取向，呈顯西、東晉在王朝驟變下的文化現象，希望能由此看出時代轉易間的士人心態及不同的思想內涵。

二、研究方法與時代界定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先採取文獻探究法，由原典的閱讀、以此掌握作

者的思想大概、了解作者原意，再則求諸史書，用歷史分析法的史學角度來明瞭歷史的流變，切入當時時代背景，由歷史背景來探討政治等外圍因素對於當時思想的影響，由此找出一個思想形成的外緣因素，這是在探究一個思想之前所須深入了解的。

在掌握了原典之後，再由當時的一些文獻、記錄士人言行之文集，與士人的文章中去分析當時士人的思想及心態，由此看出當時時代的風尚與思潮，這是由文化史的角度去歸納分析。最後藉由系統分析法的分析歸納，分析西晉末年諸位思想家與東晉時期思想家思想內容的差別，歸結出西晉末年與東晉時期士人思想與心態上的不同，並由此比較，來突顯出士人應世思想的差異性。

本篇論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欲藉此來補一般玄學史只談形上思想的不足，一般談魏晉玄學注重其有無之辯、形神之爭、名教與自然之辯，此次藉著探討當時思想，反襯出士人的應世態度，對士人的心態及思想著墨較重。

而此篇論文另一重點在探討時代思潮的轉折，魏晉玄學的主軸在儒玄雙修的思想，由這條主軸中仔細觀查，可以發現由王弼至郭象、張湛的理論修正，甚至西晉元康時期士人的享樂主義，到西晉亡國的反思、反玄運動的興起，至東晉強調事功與玄虛並重的生活態度，由這種正、反、合的理論修正模式，可以明顯發現這個時代士人的思想轉折。在思想上雖不離儒玄雙修的主軸，但內容一直在修正變化以符合當時士人需要，故本篇論文也希望能藉此見出當時士人思潮之轉變。

再則本篇論文也欲藉由當時士人文集與《世說新語》等書的探討來反映出當時士人的生命情調，《世說新語》記載了當時士人的言行舉止，可以窺見當時的時代風貌。而士人的文集反映出其內心思想，文學也是士人內心之反射，所以由此來探討，可以得到一個較為詳實的時代風格。

而史學的角度，也是本篇論文探討的重點，一個時代的思潮離不開歷史的因素。政治等外緣因素對士人應世心態的影響尤其巨大，在探討士人應世思想時，也同時由政治、歷史背景去觀照，期望由此，能對士人思想的轉變原因有一更全面的了解。

在時代的界定上，本篇論文欲探討郭象到張湛的思想轉折，與從郭象思想過渡至張湛思想反映出的時代思潮，其時代界於惠帝元康至東晉中期，由此可以發現這二個時代的思想差異性，於此我以「應世思想」為主軸，以其

較易於掌握時代心靈。在界定時代時，就以郭象到張湛所活動的時代為限。但郭象與張湛的生卒年在史書上記載不詳，在郭象方面，《晉書》本傳中只說他「永嘉末，病卒。」連生年都未著錄，在這種生卒年都不確定的情形下，本文採取莊耀郎先生在《郭象玄學》一書中的界定，他提出現今學術界普遍所接受的說法，是將郭象的生卒年定在西元 252 年到 312 年；〔註 1〕而在張湛方面，其生卒年在史籍上也沒有確切的記載，我們只能由與其同時代的、並且有關聯性的人去推測他的生存時代，在馬良懷先生所著的《張湛評傳》中，其以與張湛有關聯的三人，袁山松、桓沖與范寧來推測張湛的時代，認為張湛的時代約與范寧相差不多，應當在東晉成帝（西元 326～342）至安帝（西元 397～418）之間，而在《宋書》卷九十二〈良吏傳〉中提到張祐的「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為中書侍郎、光祿勳。」所以我們可以推測，張湛在政治上活躍的時期主要是在孝武帝時期（西元 373～396）。〔註 2〕

所以在時代的界定方面，主要的時代背景是西晉過渡到東晉的一百多年之間；由郭象與張湛的活動時代來界定，郭象的年代約在西元 252 至 312 之間；張湛的年代約在西元 326 至 418 之間，但由於張湛的生卒時代不清，而馬良懷先生界定的方式又幾乎橫跨了整個東晉，所以我們取張湛的大約活動時期，將這篇論文的時代，大致定在由西元 250 年至西元 390 年之間，大約一百四十年的時間，朝代由西晉武帝，包含惠帝及懷、愍二帝，至東晉安帝時期，其中歷經了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文、孝武等帝。論文中所提到的人物，大致上是在這個時期活動的士人。

三、語詞界定——儒玄兼修

魏晉時期是儒學與道家思想交融的時代，因此在講述這個時期時，有許多關於儒學與道學之間交融會通的語詞出現，如「儒道會通」、「儒道互補」、「儒道兼綜」、「儒道交涉」、名教與自然之會通等，在進入本論文之前，須對其中關鍵字作適當的釐析，以做為以下申論之基礎。

所謂的「儒道會通」，是指儒學與道家思想的互相影響及融合，而對儒道之間的交流會通，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試列舉如下：

〔註 1〕 見莊耀郎：《郭象玄學》（臺北：里仁，1998 年 3 月），頁 2。

〔註 2〕 見馬良懷：《張湛評傳——兼容三教，建立二元》（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25～27。

1、湯用彤在《魏晉玄學論稿》中云「會通儒道」，其云：

留儒家孔子聖人之位，而內容則充以老、莊之學說。學術宗尚，已趨於新意。而人物評價，則仍舊說。向秀、郭象繼承王、何之旨，發明外王內聖之論。內聖亦外王，而名教乃合於自然。外王必內聖，而老莊乃為本，儒家為末矣。〔註3〕

2、錢穆在《莊老通辨》中云「匯通儒道」，其云：

昔王弼何晏，以老子書上通儒術，今王衍之徒，乃以儒術下同老莊，推波助瀾，凡以獎借而助成之者，則向郭也。〔註4〕

3、唐長孺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中云「綜合儒道」，其云：

王弼更是在綜合儒道兩家。……他把孔子尊為聖人，駕於老子之上，但是這個聖人卻是體無以應有的聖人，乃是道家的聖人。〔註5〕

其在《魏晉玄學之形成及其發展》一書中也提出「禮玄雙修」的說法，他認為東晉以後的學風是「禮玄雙修」，玄學家往往都通達禮法制度，另一方面，禮學家也對玄學很有研究，注解三玄。〔註6〕

4、牟宗三在《中國哲學十九講》〈魏晉玄學的主要課題以及玄理之內容與價值〉中云「會通孔老」，其云：

魏晉玄學在當時也有個主要的課題，那就是「會通孔老」的問題。魏晉是弘揚道家的時代，在那時講道理是以老莊為標準。但當時的名士儘管弘揚道家，卻也並不抹殺孔子的地位，即聖人的地位到那時已經確定了，沒有人能否認。〔註7〕

5、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中，提出「儒道互補」，其認為儒道思想並非是對立，而是兩者互相補充與協調的，其云：

〔註3〕 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收錄於魯迅等著：《魏晉思想（乙編三種）》，（臺北：里仁，1995年），頁112。

〔註4〕 錢穆：《莊老通辨》（臺北：東大，1991年），頁363。

〔註5〕 參考自蔡忠道：《魏晉儒道互補思想之研究》（臺北：文津，2000年）緒論部份，頁2～7。

〔註6〕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昌：武漢大學出版，1992年12月），第二節〈魏晉玄學之形成與發展〉，頁73。

〔註7〕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1993年8月5刷），第十一講〈魏晉玄學的主要課題以及玄理之內容與價值〉，頁230。

(先秦理性精神)主要表現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學說，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則作了它的對立和補充。儒道互補是兩千年來中國美學思想的一條基本線索。……表面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實際上它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莊子儘管避棄現世，卻並不否定生命，而毋寧對自然生命抱著珍貴愛惜的態度，這就……恰恰可以補充、加深儒家而與儒家一致。(頁61~67)

6、許杭生在《魏晉玄學史》中說「儒道兼綜」、「綜合儒道」，他以為魏晉玄學是漢魏之際儒道兼綜思想發展的產物，其云：

正始年間的玄學家則把儒道關係顛倒過來，以道家思想為本，儒家思想為末。……正始玄學表現出的儒道兼綜的傾向，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而有其歷史必然性。〔註8〕

7、在馬良懷的《崩潰與重建中的困惑——魏晉風度研究》一書中，他則將儒道之間的交流說明為「道本儒末」、「內聖外王」的理論模式，其云：

顧名思義，所謂「道本儒末」，就是在重建新的權威思想中，以強調個體的道家學說為主幹，以注重社會功能的儒家學術為枝葉。道家所崇尚的「無」在新的建構中被奉為本、母、體，而儒家所強調的「有」則成了末、子、用。〔註9〕

所謂「內聖外王之道」，就是將強調個體精神追求的道家學說（內聖）與強調社會規範秩序的儒家學說（外王）不分彼此地揉和在一起，組成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就是將個體與社會、自然與名教、內在精神的超越與外在功名的追求協調起來，有機地融為一體而消除相互之間的矛盾。〔註10〕

這些學者對於魏晉時期的思想，多採取「儒」、「道」交流的說法，但是我們檢索古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典籍之中，「儒玄」這二個字詞連用並不陌生，在《晉書》中提到江惇：

……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

〔註8〕許杭生：《魏晉玄學史》（西安：陝西師大，1989年7月），頁18~27。

〔註9〕馬良懷：《崩潰與重建中的困惑——魏晉風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4月），頁96。

〔註10〕同註9，頁125~126。

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註11〕

在南北朝時期的《梁書·武帝紀》中也記載著：

高祖……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

〔註12〕

《梁書·伏挺傳》中記載：

……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註13〕

在《弘明集》中亦提到：

……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

〔註14〕

故而在魏晉時期的典籍之中，「儒玄」兩字連用已見先例，而「儒玄兼修」，指的是儒學與玄學的交流會通，「儒玄兼修」比「儒道會通」來講，包含了更多的層面，魏晉時期主要的思想爭論包含了：「自然與名教之爭」、「情禮之爭」、「言意之辯」、「方內與方外之爭」等，而魏晉時期的學術思想，主要是要將這些看似不相容的兩端取得一個完美的協調，能夠兼顧兩者而不偏廢之，使其兩得其中。魏晉時期的道家思想，較之先秦老莊時期的道家有著不同的義涵，如「自然」一詞，在郭象的理解中，自然還包含了「性分」，或「命限」的意思，因此光是用「道」這個詞語是無法完整地表達出魏晉時期思想的實質義涵，只有用「玄」才能表達出受到當時各個層面影響而不同於先秦時期的獨特思想文化，而玄學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也較原始的道家思想對魏晉時期士人的影響更大，這是本文所以採取「儒玄兼修」這個語詞的緣由，採用「儒玄兼修」這個說法，更能表現出魏晉士人在傳統的儒家思想與多變的玄學思潮中所受的衝擊。

〔註11〕 楊家駱：《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6月8版），冊2，卷56，〈列傳第二十六·江統傳附子惇傳〉，頁1539。

〔註12〕 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1月4刷），卷3，〈本紀第三·武帝下〉，頁96。

〔註13〕 姚思廉撰：《梁書》，卷50，〈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伏挺傳〉，頁722。

〔註14〕 《弘明集》（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卷二，〈宗炳·明佛論〉，頁28。

第二章 西、東晉時代背景解析

一個時代的思潮除了思想本身的延續與傳承外，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至鉅，社會、政治等外緣因素對於一個思想的形成有時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在探討郭象、張湛，與當時士人思想之前，實有必要對於當時之時代背景作一分析。本章由西晉末年八王的亂政開始，闡述時代的動亂與亡國後士人在渡江至江東之後心態上的呈現。東晉特殊的門閥掌權，士族與王室共掌天下的政治生態使他們的心態有所轉變，重心由國家轉向營家門，以門第爲重。第一節主要是以時代背景的論述爲主，第二節則重在文化與士人心境、思想層面的探討，由浮華隱逸之風興盛、儒玄雙修思想之形成，及此時期士人對於力與命的爭論，至宗教思想的興盛，層層轉入當時時代心靈，由大方向的思想行爲之探索，期對此時期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

第一節 不安與殺伐的歲月——由混戰到和靖

一、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的血腥奪權

西晉第二個皇帝惠帝司馬衷在位期間，司馬氏宗族發生了許多次大規模的衝突及禍亂，先後參與這些戰亂的司馬氏宗族有八個諸侯王，即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顥、東海王司馬越。這些司馬氏宗族於惠帝在位的十幾年間，發動了大小不等的奪權戰亂，動搖了西晉王朝的根基，使西晉王朝在幾年間迅速走向滅亡的命運，這些諸王之間的混戰，史稱「八王之亂」。

禍亂之出，必有其因，八王之亂的產生，導因於晉武帝司馬炎立愚庸的司馬衷爲太子，並寵信楊氏、賈氏后黨。司馬衷繼位後，皇后賈南風凶險多權詐，在公元二九一年三月，與楚王司馬瑋合謀，誣陷楊駿爲亂，楊太后同逆，遂滅殺楊氏后黨，在此次政變中，殺楊駿、楊珧、楊濟兄弟，楊駿親族和黨羽均被誅夷三族，處死者數千人，皇太后被廢爲庶人，被迫絕食而死，至此楊氏后黨全被誅滅。

六月，賈后又誣陷司馬亮、衛瓘二人有「廢立之謀」、「欲危社稷」，使惠帝下詔於司馬瑋，令其率領北軍殺司馬亮、衛瓘。司馬亮在哀嘆「如何無道，枉殺不辜」之後被害，衛瓘及其子孫九人也被殺。在司馬瑋殺了司馬亮等人之後，賈后又宣布司馬瑋矯詔，扣以殺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等罪名，將之處死。

賈后在專政時，殺害太子遹，「太子既廢非其罪，眾情憤怒」。而賈后的殘暴專政，又導致了三〇〇年四月的亂事，這一年，趙王倫發動政變，與梁王司馬彤、齊王司馬冏等打著爲太子報仇的口號，起兵殺了賈后和張華、裴頠等人，次年正月，司馬倫又廢晉惠帝，自立爲帝。司馬倫爲帝之後，眾心怨望，出鎮許昌的齊王司馬冏出兵，鎮守鄴城的成都王司馬穎和鎮守長安的河南王司馬顥也分別從北方、西方起兵響應。三王之兵馬與司馬倫之兵在洛陽附近激戰六十多天，雙方死傷十餘萬人。司馬倫的部將造反，廢司馬倫，擁惠帝復位。司馬冏帶領數十萬兵入洛，以大司馬之名輔政。司馬倫父子及其黨羽，皆被處死。

在司馬冏輔政期間，諸王之間的爭戰並沒有因此而平息，如公元三〇二年十二月，司馬顥宣稱司馬冏「有無君之心」，出兵進攻洛陽，司馬乂在城內響應，雙方軍隊展開了激戰，洛陽城陷入一片混戰，之後司馬冏兵敗被斬，黨羽二千餘人均被誅滅。此時司馬乂都督中外諸軍事，掌握了中央大權，但其餘諸王又藉口司馬乂論功不平，於三〇三年八月又發動戰爭，河間王司馬顥、成都王司馬穎聯兵討司馬乂，三方集結的軍隊，人數在三十多萬人以上，這是八王之亂之中軍隊集結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雙方連戰三個多月，死傷八、九萬人，洛陽「戰久糧乏，城中大饑」，司馬乂最後被燒死，司馬穎接管中外軍事，但他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是以在公元三〇四年七月，洛陽禁軍在東海王司馬越的統率之下，北征司馬穎，司馬越爲大都督，組織十萬兵力進軍安陽，但卻敗北，皇帝被俘，河間王司馬顥命部將張方乘機率兵佔

領洛陽，而司馬顥控制了皇權，都督中外軍事。

司馬顥的控制皇權，又導致了公元三〇五年七月，東海王司馬越在山東起兵，西向進攻關中。後司馬顥戰敗逃亡山中，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惠帝回洛陽，司馬穎、司馬顥先後被殺，惠帝也被毒死，大權落入司馬越手中，司馬越從此專擅威權，八王之亂結束。

自公元二九一年賈后殺楊駿，至公元三〇六年惠帝回洛陽，前後十六年間，朝野之間的動亂不斷，戰禍連連。而八王之戰事，正確地說，應是在公元三〇〇年開始有大的爭伐之事，在公元二九一年到二九九年的幾年之間，由於賈后在政治上除了依靠族兄賈模、內姪賈謐、母舅郭彰這些親黨外，還起用了當時名士張華、裴頠、裴楷、王戎等並掌機要，這些人有一定的政治經驗，並與賈模他們同心輔政，因此在這一段時間內，維持著一個穩定的局面，「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註1〕}真正八王之間的混戰，乃發生在公元三〇〇年至三〇六年之間，在這短短的幾年之間，發生了這麼多的戰事，使得西晉王朝的國基受到嚴重的動搖，不但民不聊生，而且人民被殺害的，動輒以萬計。更嚴重的，是八王在爭戰時，爲了加強自己的兵力，引入少數民族參加內戰，成都王司馬穎引匈奴劉淵爲外援，使得匈奴得以長驅入鄴；東瀛公司馬騰引烏桓羯朱襲司馬穎，於是烏桓遂長驅入塞；幽州刺史王浚召遼西鮮卑攻鄴，使得「鮮卑大掠婦女」。這些外族人得以利用中土爭戰的時機進入中原，而許多少數民族，也利用這個時機建立政權，後趙的石虎自立爲「大趙天王」，即云：「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得朕得至此。」

由於西晉諸王亂政，戰禍不斷，廣大田產荒廢，使人民流離失所，成千上萬的人民被迫離鄉背景，流亡異地，成爲流民。自惠帝永熙元年（公元二九〇年），由於水利失修，無年不早，造成了嚴重的饑饉，史載元康七年（公元二九七年）之後，秦、雍二州大旱疾疫，發生了大饑荒，使得「米斛萬錢」，在《晉書·五行志》中記載著「饑疫薦臻，戎晉並困」。而至永嘉時期（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晉書·食貨志》記載：

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爲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

〔註1〕 司馬光撰，楊家駱編：《新校資治通鑑注》（臺北：世界書局，1993年9月），冊5，卷82，〈晉紀四·惠帝元康元年〉，頁2612。

〔註2〕

在這種大饑荒的情形之下，人民各處流徙，西晉末年，各族人民不斷流亡，形成了一股流民潮，在公元二九八年之後的十年間，流亡人民多達百萬人以上，這些人民在家鄉無法生存，流徙各地，有的流落荒野，既受到地主的欺壓，又受到官僚的壓迫勒索，西晉政府也多次強行勒令其返回家鄉。這些流民各個走投無路，人人愁怨，於是發生了多起的武裝起義，最早有李特的起義，後有張昌、石冰等人的起義，之後又有王如、杜弢的起義。

公元三一一年，匈奴貴族劉曜與王彌、石勒等聯軍攻陷了洛陽城，晉懷帝被害，劉曜進洛陽燒掠全城，官殿與官府皆被燒盡，王公士族被殺者數萬人。自東漢末被董卓焚毀的洛陽城，雖經魏、晉將之修復，但不到一百多年，重又化為灰燼。之後劉曜進掠長安，當時關中「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晉臣擊敗劉曜，使得臨時政府維持了四年，公元三一六年，劉曜再度進攻關中，長安城中糧食盡絕，史稱「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註3〕十一月長安城被攻破，愍帝被俘，西晉以亡。

二、東晉渡江——動亂之後的苟安

（一）和靖政策——王、庾、桓、謝的主政

西晉王朝滅亡之後，原本鎮守建康的琅邪王司馬睿在江南重建政權，公元三一八年三月，司馬睿正式稱帝，是為東晉。東晉王朝共經歷了十一個皇帝（即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文、孝武、安、恭），歷時一〇四年。在元、明、成三帝在位時，主要是由王導輔政，王氏的勢力十分顯赫，子弟均布列顯要。成、康二帝是明帝庾皇后所生，在此時期外戚庾亮、庾冰兄弟掌權，王氏勢力漸衰，庾氏勢力轉盛。而穆帝繼位後，他起用徐州刺史桓溫為荊州刺史，從而取代了庾氏在荊州的勢力，桓溫掌權歷經穆、哀、廢、簡文四帝，勢力顯赫。孝武帝時，由謝安執掌朝政，亦是權重一時。因此綜觀來說，在東晉王朝的一〇四年間，由王、庾、桓、謝四大士族掌握了東晉王朝的政治走向，其對東晉政局的影響力，不可不謂大矣。

東晉立國之初，有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之說，東晉的建立，北方世家大族王導、王敦等人起了很大的助力，從初時司馬睿的移鎮建鄴到逐步穩

〔註2〕 楊家駱：《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冊1，卷26，〈志第十六·食貨〉，頁791。

〔註3〕 楊家駱：《新校本晉書并附編六種》，冊1，卷5，〈帝紀第五·孝愍帝〉，頁130。